

第五章 結論與總論：文化、社會與生活的綜合哲學

一、文化、社會與生活的整體觀

我們曾就文化、社會與生活問題作過一番反省與思考，我們的目的旨在認清這三個重要觀念及其含涉之問題，進而提出一個解決問題之方法。這三個基本概念之提出，其最終原則乃針對個人和社會之間發展過程的檢討，同時也是針對傳統中國歷史文化、社會結構、政治體制、生活方式在面對西方潮流之衝擊，所引發出來之問題的檢討。所以就理論而言，我們的目的是想達成一個有關文化、社會與生活之綜合哲學，來藉以瞭解一、這三個概念所含涉之問題，即人類社會中、個人與社會存在發展之意義問題，及探討二、中國文化社會未來生存與生活問題之解決方案。

如上所述，我們的問題顯然可以分為一般意義和歷史意義，也就是說我們不但要透過現代的學術思想來瞭解文化社會生活所面臨之問題，同時更希望瞭解如何從傳統中開拓出現代化中國文化社會生活方式之問題，亦即能瞭解如何建立一個現代化之目標。從這眼光看來，中山先生之革命事業對現代化目標之追求可說具有整體的積極的與鍥而不捨之特徵。但是我們可以說中山先生對整個現代化運動所面臨之問題，也是逐漸地於實踐過程中慢慢體會增其識度，進而把問題一層層的解決。所以我們可以總括的來說：對於文化、社會、生活等問題之探索，我們有必要找到一個基礎，以之作爲建立完整理論之根據，並逐步達成理想之目標。那麼這個基礎是什麼呢？換言之，足以認識及解決文化、社會及生活之問題的基礎究竟是什麼？

關於文化問題，我們已經提到它是一個民族歷史發展的問題。換言之，我們必須要以一個民族歷史發展爲其網脈來瞭解它。一個民族內在的生命與外在之表現，

所有歷史成績和現有活動，都可稱之為文化。析言之，文化除了物質方面物質文明之創建之外，也是一套思想方法，一套人生哲學與價值觀念理想和規範。由於文化各個部份都是相互糾結關連的，所以當一個民族面臨內在危機，或面臨外來危機無法適應克服時，就顯現其文化之弱點。所以對文化之瞭解，顯然可就其應付內在危機和克服外來危機之能力加以衡量，同時也可就其為何產生危機等現象加以瞭解。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說滿清末年所遭受之內憂外患，處處都顯示中華文化本身之問題，處處都暗示了中華文化之生機問題。

文化之生機何在？中山先生民族主義之提出是以爭取民族獨立、建立共和政體；作為解除內外危機的一種方法和認識。此種解決文化生機問題之方式可以因角度之不同而有差異。中山先生異於康梁及傳統知識份子對文化與民族危機之認識，認為中國之危機必需要以非常智慧和方法來解決，也就是要結合西方潮流，要考慮個人之普遍需要及結合人群之普遍需要來解決。我們所以認為中山先生對文化認識乃是高遠深入的，主要是因中山先生能在世界潮流中觀察中國之文化與民族之地位，更重要是他能認清西方學術潮流和政治現狀與社會現狀。換言之，中國文化問題之解決需要一個綜合之智慧，需要一個全面性對人類歷史之瞭解，同時也需要對西方思想及制度問題做一個深入之瞭解。透過這樣全盤之體會，中山先生指出，解決當前中國文化之困境之方法就是追求民族的獨立和建立共和政權。至於如何使中國文化之優點能發揮出來，以解決中國現代化問題及中國與世界現實之問題，中山先生在此祇是提出綱領，祇是提到中國之道統意義，而沒進一步發揮。很顯然，要賦與中國文化之現代意義，以應因社會人類之需要，仍須憑藉理性之思考與經驗之反省。

至於社會問題，前文已指明，生活的發展以人類的需要為基礎，而以提高政治意識為手段。所以，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是基於學理和歷史的分析所得到的結論。中國社會經此分析後，顯然需要根本改革與發揮政治意識，才能從傳統社會的弊端中解放出來，邁入現代化社會。因此我們要以民權問題的解決與否做為衡量社會進化的標準。

就政治意識的內涵而言，實包羅相當廣泛。中山先生考察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需要，而提出主權在民的觀念，還政於民的觀念，以及政權與治權的觀念，可說已具備現代政治意識基本架構。我們一方面深入解析這些觀念的來龍去脈，一方面也對支持這些觀念的基本信念——自由與平等，進行一番檢討。有了以上的認識，也就對民主社會所需的政治意識有了通盤的瞭解；基於此瞭解，我們才能進行民權的實施與發展，以及民主政治意識的提昇的工作。

再論生活問題。如果把文化視為社會歷史的背景與思想的綜合，則不妨把社會視為現成文化所包含的經濟與政治制度的結構；亦即把文化視為動態的進程，社會視為此進程中靜態的結構；生活則是在文化與社會交互影響下所呈現的一個行為的方式。生活就是人的世界，即人在食衣住行、養生送死等生活方式上的表現。即此而論，生活的內涵已預設文化與社會的存在。不過，我們也不妨說，透過生活的分析我們才能瞭解文化與社會的形態，因為生活是以文化和社會為內涵，即使個人生活也擺脫不了社會與文化的雙重影響。

然而，生活的層面顯然不只表現在文化的思考方式及制度規範中的行為方式上；其實，人類求生活與發展，滿足生活的需要，以及發揮人的各種才能的活動，也都包含了個人及社會的各種有關生命、生存、生活的活動。我們曾指出一個有機體的生活觀念，是把生活當做實現個人的生命潛力及完成社會共同的生活理想為終極目標，同時以之為發展的原動力，換言之，生活涵蓋動靜二面。

生活問題既然貫通文化問題與社會問題，何以有必要抽離其他二問題而予以獨立的考察？主因在於今日已成的文化與社會仍然不斷興起新的生活問題有待解決。由於生活本身遭遇種種自然或人為因素造成的變動，這些因素不論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人際關係、人智開展，或經驗累積所衍生的問題，文化與社會只能提供解決的基礎，生活問題才是重心，須在此基礎上予以解決，甚至有時文化與社會問題阻礙或限制了解決的方法，於是解決之道不但須解決生活問題，也須解決社會與文化問題。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是以建立完美的社會為目標。此完美社會的實現，必須以民權主義的充分實行為前提；而民權主義的充分實行又必須有穩固真實的民族文化基礎。所以，民生主義的實行取決於民族與民權主義的澈底實行。這正好相應於「文化、社會與生活是相互關連的整體」的說法，這個整體就是完整的個人，也是完整的社會。

二、三民主義結合現代與傳統的理性思考

綜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可歸結出下列四大重要結論：

(一)三民主義是正視文化現實、社會現實及生活現實後得到的正確認識，以此認識為背景提出問題，也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換言之，三民主義是基於理性認識與歷史體驗而發展出的對社會問題、文化問題、生活問題加以研究的問題學與方法論。

(二)三民主義所表現的識見，不是停留在問題現象的浮面或片面，而是遍及問題的整體與潛伏面。這需要根據深厚的經驗所培養成的先知先覺的能力。中山先生洞悉資本主義的弊病，而先主張發達國家資本並節制私人資本的辦法，即為最佳例證。

(三)三民主義做為中國現代化方案，實有其基本的哲學信念。這個信念就是人類進化觀。中山先生認為進化可分為物質進化、物種進化、人類進化的階段。關於物質與物種的進化可說是以達爾文的理論為準，人類進化則視為從洪荒時代、神權時代、君權時代到民權時代的過程。此見解突破了傳統一治一亂的歷史觀，因而不陷入傳統社會與政治的病態循環中，而能另闢坦途，提供順應進化潮流的解決之道。

(四)除了前項順應世界進化的潮流外，三民主義的另一項標準就是合乎人群的需要。如此才能使三民主義永遠有普遍性人性的基礎。

有關中山先生的哲學性思考，都可以說是基於問題學與方法論，以及根據解決問題的方法的標準而來。對於傳統思想，中山先生透過對問題的思考與西洋哲學的探討，再予以肯定、批評或改進。舉例來說，有關傳統的家族觀念，中山先生著眼於民族獨立的需要而主張予以擴充。對於傳統的知易行難的觀念，他則予以毫不保

留地批判，而以一新角度考察知行問題，傳統的知易行難說也有其歷史意義，但知難行易說顯然更具現代意義。就事實而論，人類是先會行而復知，也就是中山先生所謂「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的意思〔註一〕。中山先生又針對傳統不求深知、不求甚解的心態加以批評，而強調知難，也是強調如何真確地認知。尤其重要的是如何以客觀態度來認識經驗世界，而跳脫傳統固有的模式。這是「知難」對國人最富啟發性的解釋。當然提倡「行易」、也有鼓勵力行實踐的作用，因此具有規範的意義。「行易」並不否認實行方案或推行理想時會遭遇困難；但重要的是，若以為「行難」而畏懼實行，則困難會更嚴重而永不得解決；一旦真正著手實行，則再大的困難都可在實行的過程中謀得解決之道。「行易」的本意在促人力行，決非教人以輕率簡慢的態度來做事，這是值得留意的重點。

至於其他傳統觀念，如大學所倡：「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中山先生基於當代生產與消費的原理與事實提出批駁，而另立新義。對於傳統道德，尤其是儒家的仁義道德，中山先生引以為立國之一道理。在手著本三民主義中，中山先生曾表示，人類不只有物質生活，而且有精神生活，因而贊同孔子「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的理想。對儒家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也有所發揮。

由此可見，中山先生是就人類理想的需要與歷史的潮流來肯定中國思想，因而建立一個如何結合西方與中國的模型，以及傳統與現代的方法，至於重視自然科學，力主中國進入器械文明的工業社會，以及強調民權，從而建立法治的共和政體，都是接引西方文化的優點而融匯出的新方案。

中山先生的太極電子說，也可做為他融合古今中外學說的佐證。所謂「太極動而生電子，電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質，物質聚而成地球」〔註二〕，基本上是對近代科學自然主義在宇宙觀方面的發揮，同時把傳統的太極賦予科學的意義。中山先生又對人的精神現象有所發揮。他認為人類精神現象的基礎是生元：「生元之為物也，乃有知覺靈明者也，乃有動作思維者也，乃有主意計畫者也。」〔註三〕生元的說法顯然是對生命的原子的認識，也可說是對意識的原子的認識。我們無法

據此見解來判斷中山先生持唯心或唯物主義，但不妨視其為著重心靈發展潛力的生命哲學。又由於中山先生主張精神與物質互補互成，也可以心物合一論視之。〔註四〕

中山先生是就人類的精神與物質相互為用而言，因此若言心物合一，也應只就人類而言。這裏除了透顯出西方自然科學與自然哲學的影響外，還流露出中國哲學的基本取向。從易經，到董仲舒，以至宋明儒學，大致都持精神與物質相互為用而孕育生命的觀點：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董仲舒言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宋明儒學有理與氣相輔相成、合而為一的思想。這些觀念都有相應的地方。

由此觀之，就哲學的思考與反省而言，中山先生是採取新的語言及新的概念來說明傳統思想。因此他是用「歐洲之學說事蹟」來「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也是用「吾國固有之思想」來「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因而不但可以解決中國當前的問題，而且可進而解決人類面臨的問題。

三、對現代化堅持理性的思考

對於中山先生現代化的建國方案和思考方法與學術有了以上的認識，我們再看三民主義及其所包含的問題，就不會只瞭解三民主義文字呈現的意義或只見其明說的架構；此時我們會留心如何確實把握三民主義原始創立的精神和意義，如何活用三民主義的架構和思想，尤其是如何深入體驗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所包含的問題學與方法論思想過程。如此我們才能對中山先生的思想（尤其是三民主義）進行進一步的運用與發揮。這也是三民主義學術化的最重要的步驟。

再者，由於三民主義必須以人類進化觀為基礎，所以不論是文化、社會與生活問題都不應僵化成不可更易的觀念，我們必須顧及其中的歷史線索與現狀，以認真求知的態度瞭解問題，以理性反省的方式解決問題；此外，大智慧與大勇氣，還有保持仁心，都是突破傳統做出方案所不可或缺。

因此，從三民主義發展的過程來看，若想揀擇一個建國方略、現代化方略的基本立場，則傳統主義及本位文化主義都不合格，全盤西方論也不足取。這是因為他

們都不是針對問題提出方案，而是先服膺某種立場，也不對解決問題的學術方法加以反省。於是不論是全盤西化論或是本位文化論，在方法上都畫地自限。三民主義在形成的過程中能夠突破傳統的限制，認清問題而求得答案，如是的程序也可用在三民主義本身的研究上。此即意含把三民主義當做一個固著的歷史中的學說來研究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結合更多新的學術，對傳統做更多的思考與反省，對現時的文化、社會、生活問題，透過歷史潮流進行一正確且親切的把握。如此才真正符合三民主義發展的精神與其方法論的精神。

此時此地研究三民主義的最大癥結是把三民主義視為一成不變的教條，並視其價值是一個政治的意識形態所具有的價值。我們不可抹煞此價值，但我們必須嚴格區分做為意識形態的三民主義，以及做為一門學術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一個意識形態，具有規範性；三民主義也是一個有淵源與方法基礎的學術。因此它必須在開放的學術研討與反省中謀發展。也因此，基於三民主義發展過程的啓示，如何進一步瞭解西方的學術；進一步瞭解中國的學術，更進一步瞭解現實的文化、社會、生活問題，來結合西方學術和中國傳統的學術以解決問題，才是三民主義的真精神之表現，才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結合的唯一方式。三民主義啟發了這項結合的理性方式，這也是三民主義做為一個現代化方案的重要貢獻。

附 註

〔註 一〕參見：國父全集：第一冊：建國方略：孫文學說，第四一九～七四頁。

〔註 二〕同前註，第四五五頁。

〔註 三〕同前註，第四二六頁。

〔註 四〕參見：國父全集：「演講：軍人精神教育」，第四七九～八〇頁。